



徐 焰著

军事家毛泽东

军事家毛泽东

徐 焰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

军事家毛泽东

作 者/徐 焰

责任编辑/吴少京

封面设计/周小玮

版式设计/寇 炫

出版发行/中央文献出版社

经 销/新华书店

排 版/北京地质印刷厂照排车间

印 刷/北京地质印刷厂

850×1168mm 32开 7.875印张 190千字

1995年2月第1版 1995年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2000册

ISBN 7-5073-0246-6/E·2 定价: 10.00元

序 言

应中央文献出版社之约，国防大学战略教研室教授徐焰写了《军事家毛泽东》一书，详细论述了毛泽东一生的伟大军事业绩，并请我作序。我们军队的新一代人认真研究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和实践，是非常可喜的。就此，我也在这里写上几笔，以表示对毛主席的怀念。

哪一天是毛泽东同志的生日，60年代中期以前在党内军内曾长期是个秘密，就是跟随主席很久的许多老同志也不清楚。三十年前，即1963年的12月26日，毛主席突然叫我与为数不多的几个老同志同他一起吃顿饭。这餐饭只是多了几个普通的菜，有一点酒，并没有什么太特殊之处，不过，上桌前我还是感到有点纳闷：因为主席生活一向简朴，除外事活动外，在党内请客是很少见的。上桌后，旁边的人悄悄告诉我，才知道这一天是毛主席的70岁生日。由于从我们党进城前的七届二中全会起，毛主席就带头立下规矩，在党内不许作寿，不允许宣传自己的诞辰是哪一天，所以主席一直不说自己的生日，我们也不便向他祝寿。毛主席在70岁生日这天约我们同他一起吃饭的情景，三十年后回想起来还像在眼前。毛主席以身作则，反对党内祝寿，尤其是反对过生日讲排场、铺张浪费，这对于我们党保持艰苦奋斗和谦虚谨慎的作风，至今看来还有着深远的意义。我们纪念毛主席，也正是学习毛主席的宝贵思想以及他倡导的优良作风。对于我们这支

在毛主席指引下成长起来,有着几十年光荣革命传统的军队来说,研究毛泽东的军事活动,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更具有长远的意义。

《军事家毛泽东》一书的作者徐焰,是国防大学目前最年轻的教授。他虽然出生于解放以后,但是长期从事军事史研究,写过不少这方面的著作,过去也有好多次向我问过有关毛主席的军事活动情况。每当提起毛主席的军事活动,总引起我许多难忘的回忆。我从二十年代末参加朱毛红军时起,就一直在毛主席领导下战斗。记得在那极其艰苦的长征途中,我带先遣团过草地前曾接受毛主席当面向我布置的任务,告别时主席见我没吃东西,还把他当晚饭的几个青稞面小馒头让给我吃;解放战争期间我率部进军绥远前,毛主席在西柏坡又向我详细交代了进军的意义及注意事项;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我率第20兵团入朝前,毛主席找到中南海住处,在一同吃饭时向我提出了入朝后的几项要求;后来我在总参工作时,更是经常听取毛主席的指示,当面接受他布置的任务。我在同毛主席几十年的接触中,一直受到他老人家的深刻影响和教育。主席在处理军事问题时有着超出常人的远大战略目光,工作时有着过人的精力,平时深入浅出又充满风趣的谈话也体现了精辟深邃的思想。可以说,我们这一代人都是在毛主席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中国革命战争是在毛泽东指引下走向胜利的,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这是无可辩驳的历史结论。尽管由于某些历史的原因,毛主席在晚年的探索中有过失误,但是他的伟大思想和光辉实践,仍然是留给全党全军的宝贵财富。认真地发掘这些宝贵财富,对于我们实现国防现代化的事业,同样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回忆历史是为了服务于现实和未来。今天,我们国家和我们军队的现状与毛主席在世时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际

风云变幻也向我们提出了新的任务、新的挑战。尽管形势有所变化，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基本原理，特别是其对待军事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却仍然应是我们军队的行动指南。毛泽东在革命战争中的宝贵实践，特别是他勇于开拓的探索精神，也仍然是我们一代代革命军人努力学习的榜样。我们应进一步开展对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和实践活动的研究学习，这是对他老人家的最好纪念，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衷心希望。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consisting of three stylized Chinese characters: 杨, 成, 武 (Yang Baoli).

1993 年 10 月

目 录

序言	杨成武 (1)
第一章 “挥斥方遒”的书生从戎之路.....	(1)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2)
群雄并起，时势造英雄.....	(8)
走上独特的革命“山大王”之路	(19)
万众欢呼毛主席	(30)
第二章 天才来自实践，智慧源于群众	(40)
伟大在于“不二过”，战争中学习战争.....	(41)
注重“第二个飞跃”，不断完善认识.....	(48)
吸取集体智慧，发挥两个积极性	(53)
以群众作为大地的“安泰”	(59)
第三章 有中国特色的人民军队统帅	(68)
不愿摸枪，却毕生重视军队	(69)
在旧式武装的遗产上进行建军探索	(76)
率身垂范的伟大统帅的魅力	(87)
吸收正反经验，完善各项制度	(93)
确定全新的建军宗旨和纪律.....	(100)
第四章 驰名世界的人民战争大师.....	(108)
从“农村军事化”起步.....	(109)
掌握“唤起民众”的真谛.....	(116)

	军事政治仗，政治军事仗·····	(121)
	永放光彩的传家宝·····	(129)
第五章	战略战术的精髓——“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	(134)
	笑论宋襄公，阐明战争法则·····	(135)
	研究战争特殊规律，走有自己特色之路·····	(141)
	所谓战略战术者，说过来说过去无非就是 这四句话·····	(149)
	共产党打仗，没有什么老样·····	(157)
第六章	保卫我国安全和国防现代化的新探索·····	(166)
	从革命战争到卫国战争·····	(167)
	确定积极防御，坚持有备无患·····	(176)
	“以我为主”，实行中国式的现代化·····	(181)
	真要加强国防建设，就要降低国防费用·····	(190)
	从开始“建军史上伟大转变”到“两弹”告捷 ·····	(193)
第七章	留给后人的遗产和反思·····	(202)
	以军事方式推进国家建设的探索及其教训·····	(203)
	“现代化、正规化”问题上的蹉跎·····	(212)
	从扛大旗、打头阵中悟出的深刻教益·····	(220)
	重新寻找毛泽东·····	(229)
后	记·····	(235)

第 一 章

“挥斥方遒”的书生从戎之路

那是一个需要巨人和产生巨人的时代，如列宁所说：“伟大的革命运动会造就伟大的人物”（《列宁全集》第29卷第71页），毛泽东正是那个时代造就的巨人。

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灾难深重。自1840年“英夷”用圣贤书中从无记载的坚船利炮轰开长期封闭的“天朝”大门，惊醒了四千年的沉梦后，近代史册上所写下的记录就几乎全部是中国人屈辱挨打的历史。伴随着沦丧国土的悲鸣，强国救亡的呼声也逐浪腾高：

林则徐、魏源首倡“师夷长技”，在军事上开眼看世界，昏愤的朝廷却无动于衷；

曾、胡、左、李以“西学为用”，随之创建了西式装备的陆海军，可是却在甲午硝烟中灰飞烟灭；

张之洞一曲《自强军歌》，唤起多少学子赴东瀛入军校习武，然而徒弟却依然在师傅的威逼下接受“二十一条”……

“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青年毛泽东这一热血男儿得知袁世凯政府接受“二十一条”后的奋笔疾书，道出那个历史时代追求进步的中国人的心声。早先曾进入水师学堂、又赴日本学医，后来想在精神上救治中国的周树人，即后来的鲁迅先生，也曾与许多人一起倡导“军国民主义”，希望以“斯巴达

魂”救治国家的病弱。振兴武备的强国之梦，与救亡与启蒙一道，长期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交响曲中的主旋律。

军事上衰弱的中国呼唤军事家，可是在那些洋泾浜式的武备学堂中造就的人才中，却多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军阀武夫，战场和操练场上又只是一再抄袭德日式的战术教范。即使有如在日本士官学校获头名佩剑的兵学英杰蒋百里等，终身只能在军校讲台上和人少问津的书本上讨生活。当时谁能料到，问鼎近代中国军事泰斗者，却是那个出身于韶山乡间，从未进过军官学校，满身“书生气”的农家子——毛泽东。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近代湖南，地灵人杰。二十世纪初期，“中国如为德意志，湖南便是普鲁士”的豪言，曾在三湘志士中流行一时。

仔细研究中国近代史，人们可以发现，十九世纪寻求真理的杰出中国人多出于广东，如洪秀全（更准确地讲应是他的族弟洪仁玕）、康有为、梁启超和跨世纪的伟人孙中山。二十世纪的中国英杰却首推湖南，除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斗士黄兴、陈天华、蔡锷外，更有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以及人民解放军十大元帅中的三位——彭德怀、贺龙和罗荣桓。其中，毛泽东更是在政治、军事成就上无古人的一代奇才。

历史巨人出自三湘，并非由于远古时舜帝南下到此奏过“箫韶九成”，给这座因韶乐而得名的山峰，以及山脚下的韶山冲带来过什么“王者之气”。唯物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是，存在决定意识。如同两块燧石相撞能迸出炫目的火花，两种文化的交会和冲突点上往往会产生杰出的革命家和思想家。

十九世纪的中国广东，正是东来的西方思想与古老的中华文明激烈碰撞之地。进入二十世纪之后，广东、上海和武汉等处的殖民地化和西方文化弊端的影响日占优势，清王朝首城北京和西北内地又仍被封建腐朽的暮气所笼罩，地处广州、武汉之间的湖南则在新旧文化、东西思想的冲突中成为主要交会点。近代湖南星河灿烂的一代英杰，恰好在此背景下放射出他们自身的光辉。

清末至民初的湘人，在国内诸省中又以尚武著称。当朝廷和官军对太平天国无可奈何之时，曾国藩、左宗棠等文人以“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者万人”，连同那个在任现职官的湘人胡林翼，用“保卫名教”的精神动员号召读书人，以重饷和打仗获利的物质刺激招募起“寒谷穷苦之民”。随后，以儒生为统官，贫困愚昧之湘农为兵勇，创立湘军，出省征战十载，平定东南。后人虽然从政治上认识到曾国藩、左宗棠辈以知识分子和落后农民相结合建军的所谓“创举”，只不过是维护地主阶级利益和反动王朝命运的努力，可是当年集文才和武功于一身的“曾文正公”，以及他名下标榜的“湘学”，确实影响过一代湖南知识分子。蔡锷编《曾胡治兵语录》，名躁一时；青年毛泽东的导师和岳丈杨昌济，也极为推崇曾氏的“经世治用”之道。

毛泽东本人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一度最佩服的人物也是曾国藩。毛泽东于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的信中曾这样写道：

“今之论人者，称袁世凯、孙文、康有为为三，……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而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

后来，当毛泽东接受了阶级分析的方法之后，大概又加上蒋介石奉“曾文正公”为楷模，出于“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原则，毛泽东不再颂扬甚至极少提及曾国藩。但是不容否认的是，曾氏的一些影响仍然存留在毛泽东治政和用兵之中。如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大力讴歌，直至“文化大革命”中还风行一时的“正册”、“另册”制度，其发明者便是曾国藩。

在中国，知识分子和农民这两大因素，即能不能争取“士人”拥护并参政入营献策，以及可否征集较多的农夫从军，自古改朝换代的历次战争直至曾国藩等征讨太平天国，就一直是决定胜败的两个关键环节。出身于较为殷实的农民之家，长成后又出外求学的毛泽东，从青少年起就恰好具备了既熟悉农民又兼具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特色这两方面的条件。“天欲降大任于斯人也”，环境和历史就是这样选择了毛泽东。

毛泽东在后来一系列的回忆中对他的父亲没有说过多少赞扬的话，这位靠辛苦劳作起家，已经走上“小康”之路的富裕农民毛顺生，重的是实利，为人又有些刻薄。对于长子毛泽东，他多年当作小长工使用，所供给的伙食还不如雇工的待遇。不很和睦且时有冲突的父子关系，在家庭内部造就了毛泽东倔强和善于反抗的性格。毛泽东在解放后曾对堂弟毛泽连说过，正是由于他父亲为发财不顾骨肉之情，乘其二叔困难而买下人家赖以生活的七亩田，才使毛泽东认清只有改造这个社会，才能根绝这类事，于是下决心寻找一条解救穷苦农民的道路。这段生活经历，确使毛泽东远比其他出身富家的知识分子更深刻地了解农民的特点及苦难，为他以后从事农运和“唤起工农千百万”（其实基本上是唤起农民），奠定了他人难以企及的基础。

毛顺生虽然以受毛泽东谴责的手段积蓄起了部分钱财，然而恰恰是由于有超出普通农民的这一经济基础，他才能够经过亲友劝说和毛泽东本人的争取，供给儿子离家外出求学的费用。靠家庭的资助和本人的勤奋，青少年毛泽东走完了从读孔孟之书的私塾，到新旧学校特色兼备的湘乡高等小学，最后进入近代新型学校——湖南第一师范之路。古老与近代、传统和未来、穷乡和城

镇，这多种不同文明和特色的交会点，恰好集中到毛泽东身上，并使他具备同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所没有的特点。

本世纪初期中国政坛上风云一时的人物，还有那一大批国民党内的留学日本和西洋的归国知识分子，包括当时还为资产阶级旧民主革命奋斗的蒋介石、汪精卫、戴季陶等。与他们相比，毛泽东的人生取向始终截然不同。那些后来的“党国要人”们毕竟出身于富家，以后的革命活动又一直是混迹于军阀、官僚之中排阖纵横，乃至最后同流合污，背叛了革命（当然是指背叛了民主革命而不是共产主义革命，因为他们本来就不是共产党）。毛泽东的出身虽然不是“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并没有怎么亲身受过地主的压迫，但是他的同情和立足点却始终在社会下层人民特别是贫苦农民一边，革命的基本宗旨是为他们谋幸福。直至他晚年位居全国之首，面对国内外出现的各种矛盾，同情之所在还是国内下层群众乃至受压的“造反派”，在国外也始终支持第三世界穷国乃至美国黑人，其初衷确实终身不改。

与中国共产党第一代的其他领导人相比，毛泽东是出身于最下层者之一（据说只有原是铁路工人的项英家境更苦），而且接触实际最多，联系群众特别是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最广，对革命的策略思虑谋划最深。他没有陈独秀等人的书斋迂腐气息却有其学者风度，他不像王明一类纨绔子弟式的夸夸其谈而更善于争取群众。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十几年，领导核心经“五朝更替”，最后全党选定了毛泽东，这与青年毛泽东的素质也是紧密相关的。

毛泽东青年时的志向是“改造中国与世界”，本人的职业选择却长期倾向于教师和报人，希望以讲坛和纸笔来唤起民众。他的一手好文章，从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到长沙师范都被老师们称赞备至，在那个时代原可作为头等进身之阶，可是他却视万户侯如粪土，与蔡和森等志同道合的好友一起，以其超众的才华走上一

条冲脱世俗的反社会潮流的新途。“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正所谓文以载道，诗以言志，一阙《沁园春》，正道出岳麓山下、桔子洲头的青年毛泽东的理想和追求。

求学时的毛泽东，主张“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一直进行冷水浴、日光浴、游泳、登山、体操和露宿等活动，甚至故意不带钱而远途步行当文明“乞丐”以锻炼自己的身体和意志。这种与中国传统文弱书生完全不同，近似古代斯巴达人的苦行僧式的磨炼，是由于青年毛泽东痛感以天下为己任需要坚强的躯体和意志。毛泽东在以后的戎马生涯中能有过人的精力和一往无前、不畏挫折的意志，正是由于在此时准备了基本条件。

处于近代中国政治风潮中的毛泽东虽然长期立志求学，可是标榜“经世致用”的湘学影响，以及他同情受苦人民和决心改造社会的人生目标，又使得他在斗争风暴袭来时不可能与兵事无涉。少年毛泽东就曾佩服暴力造反，同情长沙抢米的“暴民”，视因起义被斩首的哥老会首领彭铁匠为心目中的英雄。当毛泽东年满18岁时，正值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他又马上弃笔从戎，在新军第25混成协（旅）第50标（团）第1营左队当了半年士兵。这时的毛泽东还不曾想到自己日后会指挥军队，只是革命的激情使他感到从军比读书更为重要。虽然他所在的新军没有上过战场，在军营中他却也受过一个士兵的基本操课训练，据说托四把枪和单个教练的成绩还相当可以，排教练、连教练、营的野外演习也搞过。“凡猛将必起自伍卒”，亲身以士兵身份经历军营生活的实践，对这个没有受过军校训练却在日后担当统帅的人，无疑起到了重要的军事课目的奠基作用。

由于辛亥革命以南北妥协告终，革命既不存，从军就失去意义，毛泽东主动退伍回到学校。进入民国后的湘境却再无宁日，南北交通要冲的地位，使湖南中心地带尤其是长沙附近成为军阀们

交兵的重要战场及通道，第一师范的书斋里也时闻枪炮声。为保卫学校，校内曾组织了业余的“学生志愿军”，有过当兵经历的毛泽东被选为连长。1917年南北军阀混战时，北军从长沙败退，其傅良佐部混成旅的部分溃兵乘乱在城南郊抢劫，一时全城恐慌，学校也要学生暂避。这时，“连长”毛泽东却挺身而出，指挥愿意听命的一百余名“学生志愿军”和南区一部分警察，只以少数枪械和木枪、爆竹出城迎击溃兵。在接近攻击对象时，毛泽东利用溃兵混乱无组织和欺善怕恶的心理，先以开枪和燃爆竹威吓，再施以喊话和许诺缴械即给资遣散相争取。终于使大批溃兵不战而缴枪，从而保证了市区的安宁，也向全校显示了毛泽东的组织才干和谋略水平。这次动用了武力和真枪，却又不战而胜的短途征讨，是毛泽东平生第一次指挥军事行动，出马即大获成功。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虽然当过兵，在第一师范又以指挥收缴溃兵枪械一事得到同学们以普鲁士近代军事家“毛奇”相称的美誉，而此时从外表和气度举止看，他无论如何也不像军人，却像那个时代浪漫而又有些不羁的书生。这个高大英俊的男子不大修边幅，经常长发垂耳，也不愿整理内务和遵守作息时间。毛泽东虽然在第一师范和农讲所时常督促他人习武，自己却与一些行伍出身的人不同，从不喜好摆弄武器，只是酷爱书籍。这些习惯，一直持续到他的晚年。曾与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有过交往的尼克松对两人的外表对比后，在《领袖们》一书中评价说，蒋介石的举止刻板、重风纪，住处井然有序，书法也是笔直正方；毛泽东则躺坐漫无拘束，写字信笔成书、不拘俗套，房间杂乱无章。然而，后来在战争较量中大获全胜者，却是这位从军人仪表上看来并不很及格的毛泽东。

进入二十年代后，毛泽东经历了由从师孔孟儒学，信崇曾国藩、康有为、梁启超、康德等人乃至追求日本新村主义的道路，转

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1921年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其后着力于从事工人运动，1924年以后在改组的国民党任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不久又在广州、武昌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截止1927年大革命失败，仅34岁的毛泽东虽然从事社会活动只为时几年，就已是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显赫人物，以至国民党政府在全国首批“清党”的通缉名单中也将他与陈独秀等人并列为头十几名之内。从这时毛泽东所具备的个人素质来看，他已经是一个初步成熟的革命家、政治家、策略家，一个擅长领导群众特别是有“湖南农民之王”称号的组织家，一个长于思索和思辩的哲学家，同时又是书写古文、时文都才华横溢的文章家，还是一个具有浪漫想象气质的诗人。然而，这时的毛泽东恰恰不是军事家。

直至此时还未想去搞军事的毛泽东，却已经具备了世界近代战史上著名军事家拿破仑所概括的一个优秀统帅所需要具备的几个基本素质：坚定的个性、过人的勇气、深谋远虑及优等的才学机智，而且这几方面能够均衡发展。当历史呼唤他从事武装斗争时，这些素质很快就在军事舞台上放射出惊人的异彩。

群雄并起，时势造英雄

在中国共产党早期军事活动的史册上，毛泽东并不是第一批从事武装斗争和研究革命战争的人。可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的政治形势，却把毛泽东等多数共产党人推向了军事斗争的第一线。当毛泽东和党内许多同志一起走上武装起义的道路后不久，这位不久前还“风华正茂”的书生，就在群雄竞争战争舞台上创造出比他人更加辉煌的业绩。

古往今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总是时势造英雄。毛泽东投身武装斗争，正值中国共产党在各地组织暴动之时。看看中国革命史记载，当时有南昌起义、湘赣边的秋收起义、湘鄂边的洪湖地区起义、广东海陆丰的三次起义、赣东北的横弋起义、鄂东北的黄麻起义、广州起义、平江起义……大革命失败后不到一年，一百多次武装起义的烽火就燃遍了大江南北。这种“群雄并起”的形势，为毛泽东在井冈山高举红旗创造了基本环境和政治气候。

中国共产党人在大革命失败，国民党“清党”的屠刀四处挥舞之际，还能举行如此之多的武装起义，很大程度上在于自1924年黄埔军校创建开始，部分共产党员已经奠定了中国共产党自身军事工作的重要基础。这一基础，包括思想准备、组织准备和群众准备几个方面，为毛泽东领导武装斗争创造了基本的客观条件。

武装斗争的思想基础，在于中国共产党人从建党起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学说，并载入党的一大党章，见之于周恩来、蔡和森等人自1922年以后在公开文章中关于应建立革命军队的论述，以及大革命时期对苏俄红军建军经验的许多介绍。从建党至北伐期间没有独立领导武装斗争，非不为也，乃不能也，因为缺乏最基本的条件。自1926年北伐开始之后，党中央的文件和瞿秋白等领导人的文章中，都提出过武装暴动的准备问题。只不过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此问题上也是“以俄为师”，其准备的暴力革命程序，也是先与代表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合作搞“二月革命”，待消灭北洋军阀后条件成熟，再以共产党人领导的工农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搞中国的“十月革命”。

出乎意料的是，中国的“克伦斯基”蒋介石、汪精卫辈却不待“二月革命”成功，刚刚北伐占领了长江流域，就决心“清党”，一个“四·一二”大屠杀，又一个“七·一五”“分共”，搞得共产国际的斯大林和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措手不及。